

五四運動八十年

周玉山

(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
第三研究所副研究員)

五四運動至今已八十年，其功過仍難論定，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如此，與中共的關係亦然。其間的分野與先後，值得在此說明。

八十年前的今天，北京學生基於救國的熱忱，示威抗議日本的侵略擴張，以及國內官員的受制於人，由此激起全民愛國運動，並擴大了前已展開的新文化運動。從學生的示威到全民的響應，即為五四運動一詞的最初指涉。

時至近年，五四運動的定義仍然莫衷一是，偶見爭議。部分親歷當年愛國行動的人士，認為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或任何外在因素無關。依筆者之見，此種堅持當出自以下理由：首先，五四運動本身的動機純潔，不似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駁雜。其次，五四運動本身有功無過，不似新文化運動有功有過。因此，他們主張兩者分袂。

然而，單純的愛國運動，不足以引起後來學術界如此之重視，不少人現已能接受廣義的看法，即五四運動是一種複雜多元的現象，其中包括新思潮、文學革命、學生運動、商人罷市和工人罷工、抵制日貨，以及新知識分子其他的社會與政治活動。凡此都由於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，加上巴黎和會山東決議案後的愛國情緒所激發，並因學習西方和盼望在民主與科學的光照下，重估傳統以建設新中國的精神所致。

此說將新文化運動涵蓋於五四運動之內，與另一部分五四人物的見解暗合。例如，蔣夢麟先生即以廣義釋之：「由這次愛國運動，導出了一次要求文化改革與社會改革的五四運動。」這種看法如今最見流行，從之者眾。

另一親歷者的折衷看法，也頗值得參考：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相互助長的。五四運動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，新文化運動也由於五四運動而擴大，兩者的性質原本有異，精神卻屬一貫，就是要使中國現代化。欲達此目的，必須從思想現代化做起。

持此說的羅家倫先生後更指出，能為純粹知識的主張而殉難，是人類最光榮高尚的事；能為思想言論自由而犧牲，是對社會最有實利的貢獻。凡此見解，皆在強調思想革命的重要，似可說明五四運動不僅為愛國示威而已。



不過，五四運動最主要的起因，亦即原始目的所在，畢竟是抗日救國，民族主義的成分超過其他。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，大體而言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產物，因此可謂「防衛的民族主義」，有別於古代「文化的民族主義」。同理，中國現代化在救亡圖存的心情上推出，是一種「防衛的現代化」。廣義的五四運動，就是「雙重防衛」的運動——民族主義兼現代化。

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，固紹西洋民族統一運動之餘緒，更有中華民族的血緣，首重救國保種，不言階級，強調「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」，這正是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截然不同處。後者認為「欲平天下者先滅其國」，所以主張國家凋謝論。五四運動與共產主義的嚴重差距，主要就表現在發揚與消滅民族主義上。

五四時期，中國尚未流行現代化一詞，但有識之士的理論與行動，都已觸及其內容。現代化的定義衆說紛紜，大抵是指整個社會與文化背景的綜合變遷，包括由鄉村的權威制度轉變成選舉和政黨，以及大家庭制度的逐漸消失等。五四運動所追求的現代化與此類似，標誌了傳統社會過渡到大眾社會時的陣痛。它的催生者是知識分子，催生針是民主與科學。

民主與科學是五四時期現代化的重點，也正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。當然，與民主、科學共鑄新文化之鼎者，尚有一個新文學。新文化運動先於五四運動展開，後有部分重疊，在推廣上得五四運動之助，在方向上則跨越了五四運動，走入鮮花與荆棘參差之途。只要中國一日未行民主，新文化運動就一日不得告終，世世代代的知識分子也就仍須努力了。

長期以來，中共一直非常重視五四運動的研究，有關文字以冊數計，何止上百？以篇數計，何止上千？謂之顯學，並不為過。在大陸上，五月四日是中國青年節，也是中國現代史的起點，它享有無數的榮耀，也得到過多的包裝，自毛澤東以降，相率以偽，衆口鑠金，刻意造成一個失實的五四。

一九四九年以後，中共挾其利用學生運動得勝的餘威，根據毛澤東的部分觀點，大量稱頌和強解五四運動，指為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肇端，屬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環。其實，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中共成立時，一全大會通過的黨綱和決議案，分別強調要以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，及向工會灌輸階級鬥爭的精神等，皆仰承第三國際的訓令，並無五四運動的影子。五四運動先中共而誕生，所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，是沒有共產黨的五四，自不待言，毛澤東即使貪天之功，也不能否認此點。中共成立後的表現也證明，馬克思列寧的國際主義，與五四運動的民族主義水火不容。

較之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，中共晚了二十七年才誕生。前此，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中國產業無產階級，不過一百五十萬人，只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三七，其中



大部分是剛由農村流進城市的農民、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破落戶，充滿了農民意識、行會觀念和流氓思想，沒有建黨的需要，中共的問世便落在少數知識分子身上。進而言之，如果沒有第三國際代表來華，輸入馬克思主義並移植共產黨，且在經費上全力支持，則馬克思主義一如當時不少的社會思潮，僅限於文字的介紹，中共的出生還要遙遙無期。中共建黨之初，既如此缺乏社會基礎，無怪第三國際處心積慮，將它寄生國民黨內。

一九二一年四月，第三國際派代表馬林來華，同行者還有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。他們於六月初抵達上海，敦促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，上海發起組乃通知各地共產主義小組，各派兩名代表赴滬。七月二十三日，中共一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〇八號舉行，出席者僅有十三人，此時全國共產黨員亦僅五十七人（一說五十三人），較之至少已有三十萬同志的國民黨，實不可以道里計。稍後，孫中山先生婉拒馬林所提國共合作的建議，原因之一即為中共的微不足道。大陸的史書後謂中共幫助了孫先生，實屬自壯的誇詞。

中共的第一批黨員五十餘人，其中有案可稽者四十八人，按出身與職業區分，則得大專教授七人，編輯、翻譯、記者七人，律師一人，國民黨左派一人，中小學教師六人，大學生十三人，中學生五人，工人二人。換言之，除武漢和山東各有一名工人外，餘皆為知識分子，益證中共為第三國際所製造，沒有中國無產階級的社會基礎。在此四十八人中，五人下落不明，其餘堅持馬克思主義者不過二十一人，尚未達全數之半。許多人雖在組織上入黨，其實並未樹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，也有不少人在建黨之初，對中共並無深刻認識，加入後發現不合，又行退出。中共早期的基礎如此薄弱，若無第三國際全力支持，可能旋起旋滅。

由此可知，中共的誕生與五四運動沒有必然關係，其成立前後的理論與實際，更與五四運動的愛國本質和民主信念相違。若無第三國際的移植，五四運動後能否出現中共，實屬疑問。正因有了第三國際的努力，即無五四運動，中共亦能誕生，故謂第三國際製造中共。五四運動至今已八十年，我們回顧歷史，對此當無爭論。

